

青砖不语 守护有声

辛玥 刘芝

江西南昌苏圃路1号,南昌二中校园内,一幢“工”字形的两层砖木结构楼房静静矗立。青砖清水墙,木人字梁屋顶,坐北朝南。这栋建于1925年的建筑,原是教育家熊育锡创办的心远中学校舍。1927年7月下旬,叶挺率国民革命军第11军24师从九江来到南昌,将指挥部设在这里。7月30日,叶挺在此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,传达起义决定,部署战斗任务。1961年,这里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如今,这栋楼由一个人守护着。

一扇门,推开便是十年

每天清晨,当第一缕阳光掠过东湖的水面,她推开那扇木门。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里响起,从一楼到二楼,从这头到那头。她擦拭窗台上的灰尘,检查墙角有没有渗水的痕迹,看看木楼梯的踏板是否松动。这些动作,她重复了十年。三千多个日夜,从青丝到华发。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,没有引人注目的业绩。她只是守着——守着这栋楼,守着楼里那段历史,守着那段历史背后永不褪色的信仰。

我国现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.2万余处,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37个。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就有五处革命旧址。在千千万万个纪念馆里,在星罗棋布的红色遗址中,有无数个像她这样的守护者。他们不站在聚光灯下,不常被镜头对准,他们的名字很少出现在报道里。但他们一直都在——在清晨的巡查中,在深夜的值守里,在每一次风雨来临前的检查中。

从研究到守护,初心从未改

很多人不知道,在成为守护者之前,她曾是陈列研究保管岗位的业务骨干。那些年,她的工作对象是纸张、照片、文献,在档案室里梳理史料,在展柜前推敲说明文字,在灯光下研究每一件文物的来龙去脉。她熟悉八一起义的每一段细节,熟悉叶挺指挥部的每一份档案。那段岁月里,她用专业守护着历史的“纸上记忆”。

后来,单位需要调整岗位。她主动提出,把陈列研究保管的机会留给年轻人,自己去守护旧址。有人不理解:“研究岗位多好啊,为什么让出去?”她说,研究是让历史“活”起来,守护是让旧址“立”得住,分量一样重。

这一守,便是十年。

900平方米,用脚步丈量出的山河

叶挺指挥部旧址建筑面积900余平方米。对于一个习惯了宽敞展厅的现代人来说,这个数字不算大。但对于一个守护者来说,这900多平方米的每一寸,都需要用心丈量。

有一年夏天,南昌突降暴雨。她在巡查中发现二楼东侧墙角有一小片水渍,当即爬上梯子查看——原来是屋顶一片小瓦被风掀了一角。若不及时处理,雨水渗进墙体,木质结构便会受潮腐烂。她第一时间上报,维修人员赶到时,她已经用塑料布暂时遮盖了破损处,自己浑身湿透。事后同事问她当时怕不怕,她说:“怕啊,楼比人金贵,伤不起。”

还有一次,一群参观的中学生好奇地伸手去摸墙上的青砖。她快步上前,没有呵斥,只是轻声说:“小朋友,这墙上的每一块砖都比你们的爷爷奶妈年纪还大,咱们不去碰,好不好?”孩子们乖乖缩回手。她又笑着给他们讲起了这栋楼的故事。那些从陈列研究中积累的历史细节,此刻成了最生动的讲解素材。

春天,连绵阴雨是侵蚀墙体;夏天,高温与雷暴威胁文物安全;秋天,落叶须及时清扫;冬天,防火是重中之重。一年四季,周而复始。

有人问她:十年守着同一栋楼,不觉得枯燥吗?

她只是笑笑。那笑容里有一种让人安心的笃定——就像这栋楼本身,经历了近百年风雨,依然稳稳地立在那里。

30年间,世界翻天覆地的,这里岿然不动

这30年间,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智能手机从无到有,网络从2G到5G,移动支付改变了每个人的生活方式,人工智能开始走进千家万户。南昌的中山路越来越繁华,南昌二中的校园越来越现代化。而苏圃路1号的这栋“工”字楼,依然保持着1925年建成时的模样——青砖清水墙,木人字梁屋顶,传统小瓦。

这种“不变”,恰恰是最难的“变”。当整个世界都在追求“新”、追逐“快”的时候,有人选择守住“旧”、守住“慢”。当无数人在时代浪潮中不



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叶挺指挥部旧址

断变换赛道,有人选择在纪念馆里一直默默坚守。

革命文物承载党和人民英勇奋斗的光荣历史,记载中国革命的伟大历程和感人事迹,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。保护革命文物,保持原貌——这句话落实到具体工作中,就是日复一日的巡查、擦拭、检查、守护。她的“不变”,让这栋楼的“不变”成为可能。

一栋楼,承载一代人的信仰

这些年,来参观的人越来越多。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,在楼前久久伫立;有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,仰着头听她讲叶挺的故事;有从外地专程赶来的党史研究者,在二楼会议室里仔细端详每一处细节。

她记得有一年建军节,一位90多岁的老人被家人推着轮椅来到旧址。老人望着这栋楼,眼眶湿润了,对她说:“我小时候就住在这附近,那时候听大人说,叶挺的队伍来了,老百姓都高兴。这楼还在,真好。”

她听了,鼻子一酸。那一刻她更加确信——自己守的不仅仅是一栋楼,是一代人的记忆,是一座城市的根脉,是一个民族的精神。

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曾推出微电影《八一守护人》,镜头对准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文物保管员、资料研究员、安保人员。她也是其中之一。在微电影之外,在新闻报道之外,在所有人的视线之外,她依然每天推开那扇门,开始新一天的守护。

十年旧址守护,她熟悉这栋楼的每一处细节:哪块地板踩上去会有轻微的响动,哪扇窗户起风时会发出特别的声响,哪个角落的墙皮最容易受潮。这些细节,是时间留给她的勋章。

守护,是另一种传承

一个人的30年,放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。但正是无数个这样的“一瞬”连在一起,才构成了传承的链条。

1927年那个夏天,叶挺在这栋楼里运筹帷幄,部署起义。近百年后,她在同一栋楼里擦拭窗台、巡查隐患。时空在这里交汇,使命在这里延续。她已经用塑料布暂时遮盖了破损处,自己浑身湿透。事后同事问她当时怕不怕,她说:“怕啊,楼比人金贵,伤不起。”

从陈列研究到旧址守护,从“纸上记忆”到“砖瓦记忆”,她完成了职业生涯的一次转身,也完成了一次精神的接力。把研究的舞台让给年轻人,把守护的责任扛在自己肩上——在她看来,这不是牺牲,是另一种传承。

每一处革命旧址的背后,都有像她这样的守护者。他们或许没有耀眼的光环,没有响亮的名头,但他们用最朴素行动,诠释着什么是对历史的敬畏、对信仰的坚守。

致敬,平凡的坚守

她,是一个人,也代表了一线革命旧址文物守护者。致敬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坚守的人。致敬那些在喧嚣时代里选择安静守护的人。致敬那些没有鲜亮业绩,却用三十年如一日的坚持书写不凡的人。

当游人走进叶挺指挥部旧址,看到那栋保存完好的“工”字楼,看到楼上复原的会议室、办公室,或许不会想到——这一切的背后,有一个人用十年的时光,一天一天地守护着。

她的名字,也许不会被很多人记住。但这栋楼会记住,这段历史会记住,那些因她的守护而得以瞻仰旧址的人们,会记住——在南昌苏圃路1号,有一个人,用十年,守护了一座楼,守护了一段历史,守护了一种精神。一个人,一座楼,十年。

(作者单位: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)

云冈石窟第1窟南壁窟门与明窗间雕刻圆拱形门楣,楣尾二龙回顾。圆拱楣宽约255厘米,楣中央残高约70厘米。楣面中央为坐佛,两侧各对称分布4身侧身相对的胡跪供养天。中央坐佛趺坐于方形台座上,身着褒衣博带式佛衣,肩部以上坍塌不存,仍可辨双手于腹前结禅定印。两侧供养天头梳高髻,无头光,身穿宽袖交领衣,袖端及肘,下着裙,腰束带,双手合十或捧物于身侧。从中央至前3身供养天后从腋下飘出呈双三角状的帔帛,衣纹较为密集,此式帔帛在云冈石窟中独一无二。

1921年出版的日本照相师山本明《云冈石窟》及2018年出版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著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译的《云冈石窟》第十七卷中岩田秀则1925年拍摄的照片显示,因纵向贯穿的大裂隙和壁面表体的剥落,第1窟门楣中央坐佛及紧挨坐佛

溯源辨真身 寻踪补史阙

——云冈石窟第1窟门楣流失造像

伍雅涵

的2身供养天以及右侧第2身供养天头部已残损,但其他供养天像保存完好。水野清一、长广敏雄1944年调查云冈石窟时的照片显示此门楣又因盗凿已破败不堪。结合现在门楣造像保存状况,可知至少有4身供养天全身被盗凿,右侧从中央数第3身,左侧则是第2、3、4身,盗凿时间应为1925年之后。1929年民国政府官员常惠调查时在右侧第3身、左侧第3、4身供养天盗凿后的痕迹处用红漆涂数字。目前这4身供养天其中有3身已找到收藏地。经调查对比,其中1身胡跪供养天现收藏于日本美秀美术馆。供养天高髻直立,弯眉细眼,鼻梁通直,嘴角上提,双耳垂肩。着圆领内衣,外着覆双肩对领宽袖衣,左衣端落于左肘部,腰束带,左上臂衣纹阴刻于右侧身并列,左股衣纹则对上向的弧线,右腿上股下胫衣纹相对呈尖角状。双手上举于右胸前,左手残破,右膝立起,左膝跪地,身体向右侧胡跪。盗凿时发髻、脸部和右肩部连同右侧的岩体一起凿下,身体右侧部呈较完整的弧线,左膝头呈弧状,跪立的左脚尖和右脚尖均缺失。两手的上下、胸的部分、从下腹部到右膝部分都残留着绿色和棕色的色彩,高48.2厘米。此像为日本秀明文化财团收藏,日本学者称其为“秀明像”。片山宽明《从供养天像看云冈石窟的编年》虽详细介绍了“秀明像”的具体情况,仅推测来自云冈石窟第1窟,但没有提到具体位置,也没有谈及供养天像的来历。我们在1930年德国柏林出版的《纪念约尔格·特鲁布纳:他最近一次中国之旅的成果》一书中首次见到这尊像被盗凿后的照片,书中说是云冈石窟第2窟的菩萨像,但也没有提及造像的来历。在美秀美术馆1997年常设展前曾于1996年借给美国哈伯德大学的萨克勒美术馆展出。据老照片图像资料,通过与洞窟现状的多次观察对比,第1、2窟东西壁圆拱龕龕楣内也雕刻同样式的胡跪供养天,但尺寸相对较小,且多无缺失,而此胡跪供养天与第1窟门楣内左侧第3身供养天非常相符。洞窟内痕迹身体右侧直,右膝部突出,左右脚脚尖留存,还保存着原浮雕飘于身后的两段三角状帔帛和两段帔帛,上书红漆“10”。痕迹残高48厘米,包含盗凿痕迹残宽27厘米,基本与“秀明像”尺寸相当,无疑是第1窟门楣内左侧的供养天。

另外2身收藏于美国的波士顿美术馆,其面貌表情、造像风格、衣纹走向、姿态等与“秀明像”一致,应是一组造像。一身为向左侧胡跪的供养天,同样是头梳高髻,双手合十偏于身体左侧,立左膝跪右膝,左膝部缺失,高49.6厘米、宽18厘米,当为门楣右侧缺失的第3身供养天。左脚尖恰恰留于窟内此区域,还可见身后一段帔带,红漆书写“3”。残存痕迹高49厘米、最宽处18厘米。另一身侧身向右,上举于右胸的右手超过身体,左上臂略前平举,跪立的左脚完整,且腰身、左臀与左脚脚面有两处内凹的弧线,高52.5厘米、宽18厘米。其特点与老照片中第1窟门楣内左侧第4身相契合,因处于门楣近竖直的部分,立起的右胫与跪地的左膝呈叠状,右脚蹬于左膝之上。与洞窟内的供养天痕



日本美秀美术馆藏供养天像

迹现状相符,身体右侧痕迹呈较完整弧线状,合十的双手突出于身体右侧呈小尖角状,肩、臀部呈优美的二段弧线于腰部略东进,左脚尖点地与左膝间有段空隙,无帔帛,红漆书写“11”。这一对供养天原为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的查尔斯.B.哈特收藏,现藏波士顿美术馆,编号50.1758,两像都残留绿色、棕色等彩色。1902年,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到云冈石窟调查,发表《北清建筑调查报告》《支那山西云冈石窟寺》等文章,云冈石窟重新进入世人视野。1907年,法国汉学家沙畹来到云冈石窟调查,并拍摄了大量照片,氏著《北中国考古图录》于1909年至1915年间出版,收录云冈石窟78幅珍贵照片,云冈石窟首次以图片的形式传向全世界。此后,世界各地的历史学、美术学、考古学、艺术家等学者来到云冈石窟考察,同时不法文物商贩、盗贼、军匪也来到云冈石窟,诱导村民等偷制佛像售市。1929年蔡元培致电阎锡山,严防保护。后国民政府派警察驻守云冈石窟,1931年大同县设立云冈石佛寺保管委员会,盗凿之风收敛。

姜亮夫在《莫高窟年表》中讲到“关于云冈形制内容研究,以法儒沙畹最早而最详确。解说图释,均极允当,且以此而云冈之名,震耀于世,因以启帝国主义者盗窃割裂之机。石鼓、寒泉、灵岩、万佛诸洞,被毁最甚云”。石鼓、寒泉洞即第1、2窟。第1、2窟开凿于云冈石窟东部窟区东端的一个独立山体,相距中部窟区200余米,地处偏远,保护不周。从20世纪20年代的照片看,第1、2窟前旧有二条通向西部的道路,周围没有任何围挡措施。而且第2窟前壁明窗与窟门间壁面坍塌,墙体破败不堪,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出入,因此成为云冈石窟造像被盗的重灾区。通过洞窟现场调查,仔细辨别盗凿痕迹与风化的不同,对照20世纪20年代及40年代照片对比现在洞窟造像的保存状况,辨识出第1、2窟被盗凿的佛、菩萨、供养天等造像90余尊,可以复位的造像有10尊。第1窟门楣供养天的复位为研究洞窟造像的风格、纹饰以及壁面布局等提供了翔实材料,也为云冈石窟流失文物的追踪与研究积累了重要基础数据。

新修订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》提出要推动开展历史上流失文物的溯源和流转历史研究,云冈石窟盗凿残迹的系统调查和流散文物的调查、溯源、研究及复位工作是新时期石窟考古的重要工作内容,也是探索石窟寺保护利用新模式的重要内容之一。

【本文为山西省文物局云冈学研究项目“流散日本的云冈石窟造像资料搜集、整理与研究”(2025KJ03)阶段性成果;作者单位:云冈研究院]

三版、四版责编: 续红明 王 娟 李 端

宋金铜镜功能与题材的世俗化

——以枣庄市博物馆藏铜镜为例

田亚男



许由巢父故事铜镜

吉祥铭文铜镜

人物故事镜、吉语镜、仿古铜镜等成为主流。枣庄市博物馆藏铜镜清晰呈现这一变化。馆藏金许由巢父故事铜镜,直径16.2厘米,缘厚0.4厘米,重641克。镜背高浮雕刻画许由临河洗耳场景,上部峰峦叠嶂,树木葱茏,最下方是奔腾不息的河流,山石、树木、人物布局简洁凝练。“许由巢父”出自晋皇甫谧《高士传·许由》,借由上古典故映射了当时文人阶层对“隐逸文化”的推崇。工匠将大众熟知的故事镌刻于镜背,不再宣讲升仙长生,而是传递信义、个人品德等世俗伦理。这类人物故事镜,取材多来自民间文学,包括牛郎织女、蹴鞠耍戏等,故事内容通俗易懂,契合市民阶层的审美趣味。

花卉题材铜镜的流行,同样是世俗化的直观体现。宋人爱花,赏花簪花、花市贸易、插花园艺蔚然成风,花卉被赋予人文意蕴并广泛运用于各类器物装饰,直接推动了花卉纹铜镜的流行。馆藏宋缠枝花卉纹铜镜,直径12.3厘米,缘厚0.2厘米,重116克。铜镜呈八瓣菱花形,小组,四朵花配置在圆形枝蔓之中,花叶外一圈连珠纹,素缘。纹样不再追求雄奇繁复,重在吉祥寓意。镜上花草鱼虫,取自日常可见风物。

形制与功能:礼器属性消退,日用属性凸显

在日常生活中,铜镜主要承担审美观赏与礼制规范两大功能。时人可借助铜镜整理容貌妆饰、衣冠仪态,实现自我审美映照;同时,古代礼制对仪容装束、举止仪态的严苛规范,也需要依

托铜镜。伴随社会经济繁荣,原本服务于上层阶层审美与礼制需求的铜镜,逐渐普及至民间社会,成为百姓的日常生活所需。

形制创新,是服务日常使用最直接的体现。带柄镜、桃心形镜、钟形镜、八边形镜出现。其中,带柄镜是宋代铜镜标志性器型。馆藏宋有柄双凤纹铜镜,直径13.2厘米,柄残长6.8厘米,缘厚0.45厘米,重292克。圆形带柄,柄下端缺失。纹饰区与镜边缘之间镂空,双凤作展翅相对盘旋状,一凤尾羽向右卷曲,尾羽作蔓草形。另一凤尾羽向左上舒展,多根细长而有齿状的尾羽曲曲弯弯。其外饰弦纹一周。窄素缘。铜镜增设手柄,手持握可使用,无需镜架,极大方便日常梳妆。形制设计以使用便捷、审美喜好为出发点。

商品经济的繁荣是推动这一转变的核心动力。随着市场消费需求持续扩张,铸镜手工业摆脱了以往的生产模式,转向面向社会大众的商品化生产。铜镜的商品属性不断凸显,依托市场流入民间,由少数上层群体的专属器物,转变为市民阶层能够普遍购置、日常生活的生活用具。

镜铭内涵:从颂神纪功到商号吉语

镜铭是解读铜镜所承载时代内涵的重要资料。镜铭蕴含丰富的思想意蕴,既有“见日之光天下大明”“内清质以昭明夫日月”这类寄寓对日神崇拜的吉语铭文,亦有“尚方作镜真大巧,上有仙人不知老,渴饮玉泉饥食枣,浮游天下遨四海,寿如金石住且好”,是汉代黄老神仙思想的具象



有柄双凤纹铜镜

表达。镜铭文辞典雅,以长生久视、升仙求福、家祚永固为核心主题,带有浓厚的信仰色彩。

宋代铜镜铭文风格与内涵发生转变,商号商标与通俗吉语流行。馆藏宋薛公双龙纹铜镜,直径10.8厘米,缘厚0.2厘米,重97克。圆形,桥形小钮,圆钮座。钮座内铸有“薛公制造”四字,座外饰双龙绕钮相戏。素窄卷沿。双龙纹样是宋代流行的铜镜题材,镜背镌刻“薛公制造”是典型的商品广告。铭文标注工匠姓氏,本质是古代商标。民营作坊依靠名号打造口碑,在市场竞争中吸引买家,是商品经济繁荣的实物见证。

吉语铭文镜褪去汉式辞典雅玄奥,语言直白通俗。“长命富贵”“福寿双全”“天下太平”等吉语,寄寓了普通百姓朴素的生活期许。馆藏宋吉祥铭文铜镜,直径13.2厘米,缘厚0.3厘米,重192克。八瓣菱花形,圆钮,圆钮座。钮座外两圈凸弦纹内有篆书“福寿家安”四字,每字之间填一喜字图案。外区有篆书“清素传家,永用宝鉴”八字,并以一圆点结尾。

工艺美术:弃繁从简,实用优先

汉唐铜镜追求精工华丽,铸镜时使用高浮雕、鎏金、错金银等工艺手法,铸造成本高,视觉效果辉煌瑰丽。宋以后铜镜整体铸造风格转向简约朴素,以浅浮雕为主,纹饰线条简练,铜质与铸造精细度整体不及汉唐。所以学界普遍认为我国铜镜发展至宋代已经走向衰落。出现这种变化并非因为手工业技术倒退,而是当时市场选择的结果。面向大众消费市场,民间作坊需要控制生产成本,兼顾性价比,优先保障照容的基础功能,不再追

求繁复奢华的装饰。审美风尚随之改变,汉唐崇尚雄奇华丽、神权威严;宋金无论文人还是市井群体,更偏爱平实淡雅的风格。镜背纹饰重在表意,不再以繁复工艺彰显持有者身份。当然,部分精品镜仍有细腻刻画,但不再是主流。器物评判标准,从是否彰显身份、沟通神灵,转变为是否好用、纹样寓意是否讨喜。审美下移,也体现于手工业领域。

宋元铜镜世俗化转向的历史动因

枣庄市博物馆藏宋以后铜镜呈现的世俗化特征,折射出社会结构与思想文化的深层变革。首先,商品经济繁荣与市民阶层崛起。两宋打破坊市制度,商品经济空前活跃,市民阶层壮大,催生庞大日用市场。民间手工业蓬勃发展,铸镜作坊走向商品化生产,产品供给普通民众的消费需求。其次,思想观念的更迭。汉唐盛行神仙方术、谶纬学说,人们热衷于长生升仙。两宋理学兴起,社会思想趋向理性,世人关注点从死后彼岸世界,转向现世人间生活。再者,文化艺术的世俗化浪潮。宋词、话本等共同推动文化走出贵族圈层,走向大众。不同艺术门类互相借鉴,民间故事、花鸟小品成为共享的文化符号,绘画、文学题材直接移植到铜镜纹饰之上,形成图像体系的互通。最后,手工业管理体制变革。民营作坊成为产业主体,生产目标由满足官府、贵族需求,转变为迎合市场买家喜好,市场需求直接决定铜镜的题材、形制、工艺与定价。

枣庄市博物馆藏铜镜,是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物质文化遗产。外来商品铜镜在此流通、使用、埋藏,反映区域民众的消费习惯与审美选择。宋以后铜镜的世俗化,本质是文化下移的物质缩影。当神异仙境褪去,人间烟火登上镜背,一面小小的铜镜,便成为触摸古代社会鲜活面貌的实物史料。对馆藏铜镜的整理与研究,既可以丰富鲁南地区物质文化研究,也为理解中国古代铜镜发展脉络提供来自地方博物馆的观察视角。

(作者单位:枣庄市博物馆 奚栋(图))